



近代中國是怎樣
衰落下去的？



20 世紀 30 年代，北京、上海曾對高級知識分子做過一個調查，其中有個問題是：你的夢想是什麼？

著名作家林語堂這樣回答：“只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乾淨土。”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這樣回答：“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任憑有極好的政治制度，也是無益的。”

著名文學家施蛰存這樣回答：“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現在是不敢罵的。”

為什麼那時的中國與“五千多年文明古國”反差這麼大？為什麼這些夢想現在聽上去讓人覺得可笑又可悲呢？

近代中國到底是怎樣衰落成這樣的呢？

叩頭還是鞠躬？

觀念僵化錯失歷史機遇

1793 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派出了 700 多人的龐大使團，由特使馬戛爾尼率領艦隊，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使團攜帶英國工業革命後取得的尖端科技成果，如地球儀、望遠鏡、蒸汽機、棉紡機、迫擊炮、步槍等，作為慶賀乾隆皇帝 82 壽辰的禮物，希望借這次機會與中國正式



乾隆皇帝像

建立外交關係，實現雙方貿易開放。

可惜，當時的清王朝統治者對世界大勢茫然不知，仍然自詡為“天朝上國”，將中國以外的國家一概視為“夷狄蠻貊”，就是野蠻人的意思；把西方先進的科技成果斥為“奇技淫巧”，就是讓人著迷上癮而又沒啥大用處的東西。

因此，當“蠻夷”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拒絕對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禮時，乾隆皇帝雖然准許他按英國禮節單膝下跪呈送國書，但斷然拒絕了英國使團關於拓展兩國貿易的全部請求。

23 年後的 1816 年，不死心的英國再次派出使團來中國，希望強強聯合，進行貿易，但當朝的嘉慶皇帝跟乾隆皇帝當年一樣，堅決要求使團行跪拜禮，英國使節則堅持只能行脫帽鞠躬禮，雙方再次不歡而散。因為禮節問題，中國再次錯過了融入世界、順應潮流、實現發展的機會。

1840—1842 年，已看透大清帝國徒有其表這一現實的英國，為保護鴉片貿易，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沒有用外



馬戛爾尼像

交打開的大門，用戰爭打開了；清朝以不磕頭為由拒絕的對外開放，用卑躬屈膝、割地賠款的方式接受了。對此，當時的美國總統小亞當斯敏銳地指出：“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那麼，為什麼當時的皇帝都不屑、不願、不想讓自己的國家與外國開放交流呢？根本原因就是思想觀念的保守落後。

明朝實行“海禁”，清朝只許“一口通商”，中國一直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簡單地說，一方面，就是“自己人別出去”，禁止出海離境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往來。即使明代鄭和下過西洋，那也只是為了揚國威、炫武力。其背後的心態，就是覺得中國地大物博，不像英國、日本等國土狹小的島國，需要通過貿易才能滿足自身需求。因此，盲目自大的中國人不稀罕從海外獲得貨物，更談不上學習外國，一心只想關起門來過自給自足的“好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外人別進來”，嚴格限制海外各國洋人來華貿易。在古代，中國一直以接濟遠方窮親戚的心態對待海外列國，但凡外國使臣朝貢，只需帶很少的禮物來，走時卻能得到價值為禮物數倍的封賞，驕傲自大的虛榮心自此養成且日益膨脹。

閉關鎖國在中國稱雄天下之時可能沒什麼大問題，但在世界其他國家迅猛發展、不斷崛起時就會成為戰略性錯誤。

17 世紀中葉的世界形勢，就發生了清朝皇帝渾然不覺卻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1640 年英國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枷鎖，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1760 年英國又開始了工業革命，從工場手

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隨著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建造、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還有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等，人類對大自然的征服力越來越強。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 200 年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瘋狂的對外掠奪和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然而，就在西方海外殖民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乾隆皇帝仍不能正視世界形勢的變化，不是順應潮流，而是採取鴕鳥政策，更加嚴格地限制對外貿易。

1787 年，曾開創盛世、多次平叛，後來自稱“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寫了一首詩：

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
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用通俗的話來解釋這首詩，大致是這樣的：近幾年，隔三岔五總有外邦小國的“粉絲團”前來，可我天朝上國應有盡有，什麼都不缺，所以我們寧可閉關不開，也不能讓這些“粉絲團”來煩擾或帶來危險。現在大清國運昌盛、形勢極好，有時暗暗想到月盈月虧的自然規律，心裏不免有點兒小擔心呢。

英明神武如乾隆皇帝，在中國對外交往和走向世界方面的見識尚且如此，其他皇帝思想保守的程度更不難想象。

正是在長期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下，中國商人不能主動去尋找海外市場，導致手工業發展緩慢；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暢，阻礙了中

國近代科技的發展。

對此，當時遠在西半球的馬克思在了解中國國情後，十分痛惜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

富了就會強嗎？ 腐朽制度使人心散如沙

19 世紀初，當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發展並向外實行大規模的殖民主義擴張時，中國正處在封建社會的晚期，在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下，中國的封建制度日趨僵化保守和失去活力。清王朝自嘉慶以後國勢日衰，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政治上更加腐敗，官場貪污盛行、賄賂成風。道光年間軍機大臣穆彰阿攬權賣官、假公濟私，無能之輩只要給他送一份厚禮，就能升官晉職。直隸總督琦善於 1841 年被抄家，查抄出的家產有黃金 1 萬多兩、白銀 1800 萬兩、珠寶 11 箱。中央大員如此，地方文武官員也大都搜刮無度。“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句廣為流傳的順口溜，就是對當時清朝吏治腐敗的生動寫照。

經濟上生產凋零，貧富分化加劇。貴族、官僚、地主利用各種手段兼併土地，其結果是土地集中的程度越來越嚴重，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加之耕作技術保守落後，農業、手工業徘徊不前，普通

老百姓尤其是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更為艱難。

軍事上武備鬆弛、裝備落後，軍紀敗壞、士氣不振。清朝中期雖有八旗兵和綠營兵 80 餘萬人，但乾隆之後天下承平日久，和平積弊日漸深厚，昔日的“草原雄鷹”由於缺乏訓練、終日閒遊，甚至聚眾賭博、酗酒狎妓，戰鬥力每況愈下，終於變成了提籠中的“八哥”“畫眉鳥”，實際上已擔當不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有的人可能會說，就算是這樣，當時的中國也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富國，也不至於被人隨便欺侮。

的確，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的統計，1830 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1/3，要知道，現在美國經濟總量也只是佔世界經濟總量 25% 的水平。當時的中國可謂富甲天下，無可匹敵。

富國並不自然就是強國。

清王朝雖然富有，但主要富在統治集團和地主階級，而不是廣大民眾；富在私有財產，而不是國有財產。“康乾盛世”之後，嘉慶皇帝靠查抄了巨貪和珅的全部家產才填補了嚴重的財政赤字，所以才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皇帝權貴有錢大修宮殿園林，貪官富商有大把的銀子買鴉片快活，清政府卻沒有多少銀子發展新式武器，甚至連軍餉都發不下去。

富而腐化，富而不強，清朝就像一個營養過剩、沉迷玩樂、體質虛弱、毫無鬥志的大胖子，中看不中用。

只要齊心協力、同仇敵愾，就算打不贏，也能打個平手吧？

但這只是一種可能、一個願望而已。

殘酷的現實，正如近代大思想家嚴復所指出的：“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嚴復（1854–1921），近代思想家、文學家、翻譯家。

封建制度下的中國，王朝的變換只不過是佔據皇帝寶座的家族的變換而已：漢朝是劉家的，唐朝是李家的，宋朝是趙家的，明朝是朱家的，清朝是愛新覺羅家的。

普通老百姓追求的是《桃花源記》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理想生活，不管皇帝姓啥，也不管是何朝代，只要能解決溫飽就行。他們甚至認為，洋人來中國搶的是皇帝的地，賠的是皇帝的錢，與自己何干？正因如此，孫中山後來才痛心疾首地說：“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這是近代中國遭受屈辱、貧窮落後的內在原因。

落後就要捱打，富而不強 就會任人欺凌

19 世紀，英國為改變對華貿易逆差，採取了向中國走私販賣鴉片毒品的可恥手段。

雖然清政府嚴禁鴉片進口和內地商人販賣鴉片，但在腐敗官員

和不法商販的參與下，鴉片輸入從乾隆初年的每年約 400 箱，到嘉慶初年的每年約 4000 箱，到道光十五年（1835）時達到了每年 30000 箱。

鴉片貿易使英國榨取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錢，而使中國人變成了“東亞病夫”。

1839 年，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將收繳的全部鴉片用鹽鹵和石灰銷毀，從銷煙池傾入大海。這一事件被稱為“虎門銷煙”。虎門銷煙顯示了中國人民嚴禁鴉片和反對外來侵略的決心與魄力。

禁煙運動對中國而言是正義之舉，但英國政府和鴉片商人卻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於是，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爭就這樣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840 年 6 月—1842 年 8 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統帥率 28 艘軍艦、15000 人，靠堅船利炮攻城略地、殺人放火。清政府戰無強兵、抗無鬥志，愛國主戰的欽差大臣林則徐被革職發配新疆，投降妥協的大臣琦善卻被道光帝認為是“片言片紙，連勝十萬之師”。最終結果是清政府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設領事館；賠款 2100 萬銀圓。

《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僅破壞了中國領土完整和關稅司法的主權，更開創了用條約形式使外國勢力掠奪和奴役中國“合法化”的先例。

為什麼 19 世紀的中國會被那麼多國家輪番侵略？就是因為第一



中國共產黨人
怎樣拿起槍桿子？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並沒有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組織和發動工農運動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集團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又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當一個個優秀的共產黨人倒在血泊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慘痛的教訓。在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響亮地提出了論斷：“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又繼續戰鬥了……

一場特殊的晚宴

1927年7月，朱德遵照中央軍委指示來到南昌，具體籌劃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

之所以派朱德來南昌，是因為駐守南昌的國民革命第三軍是雲南部隊，朱德與這支部隊的高級軍官們有著很深的淵源，曾擔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對南昌各方面情況比較了解。

7月31日，南昌城內的佳賓樓上觥籌交錯，熱鬧非凡。只見朱德端起酒杯，一再向第三軍第二十三團團長盧澤明、二十四團團長肖日文和兩名副團長敬酒。

人們不禁納悶：朱德為什麼要宴請幾個團長？殊不知，一場重大的軍事行動正在南昌城內秘密進行……

朱德利用自己的身份，事先已為黨提供了敵人的兵力和駐防情

況。他這次宴請幾個團長是為了拖住駐南昌的這兩個團，保證起義的順利進行。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為拖延時間，朱德又拉他們打牌。打得正酣時，賀龍手下的一個副營長突然闖了進來，報告說剛剛接到命令，今晚要解除滇軍武裝。朱德一聽，知道這個叛徒已經洩露了起義計劃。他不動聲色，笑著安撫幾個團長的情緒，表示可能是謠言，繼續打牌便是。然而，幾個團長再也無心戀戰，紛紛起身告辭，朱德也不好強留。

幾個團長剛走，朱德立即趕到起義總指揮部，將叛徒告密一事通報給了賀龍。賀龍又趕緊向坐鎮中共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的周恩來作了彙報。於是，前委作出緊急決定，起義提前兩個小時舉行。

8月1日凌晨2點，南昌城內槍聲大作，武裝起義開始了。

起義總指揮部設在江西大旅社。它的地理位置優越，四層樓上面，還有一個兩層的亭閣，是當年南昌城內最高的建築，站在樓頂，全城景象一覽無餘。

在那個漆黑的夜晚，起義部隊以“河山統一”為口令，脖繫紅領帶，臂繫白毛巾，向敵人發起了猛攻。

其中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敵總指揮部所在地舊藩台衙門一帶。敵警衛團由於事先得知消息，便憑藉有利地勢，在制高點上集中火力阻擊起義軍。賀龍率第二十軍奮勇當先，從正面衝上鼓樓，壓制住敵人的火力，並從後院翻牆衝入敵人陣地，與敵人展開白刃戰。戰鬥持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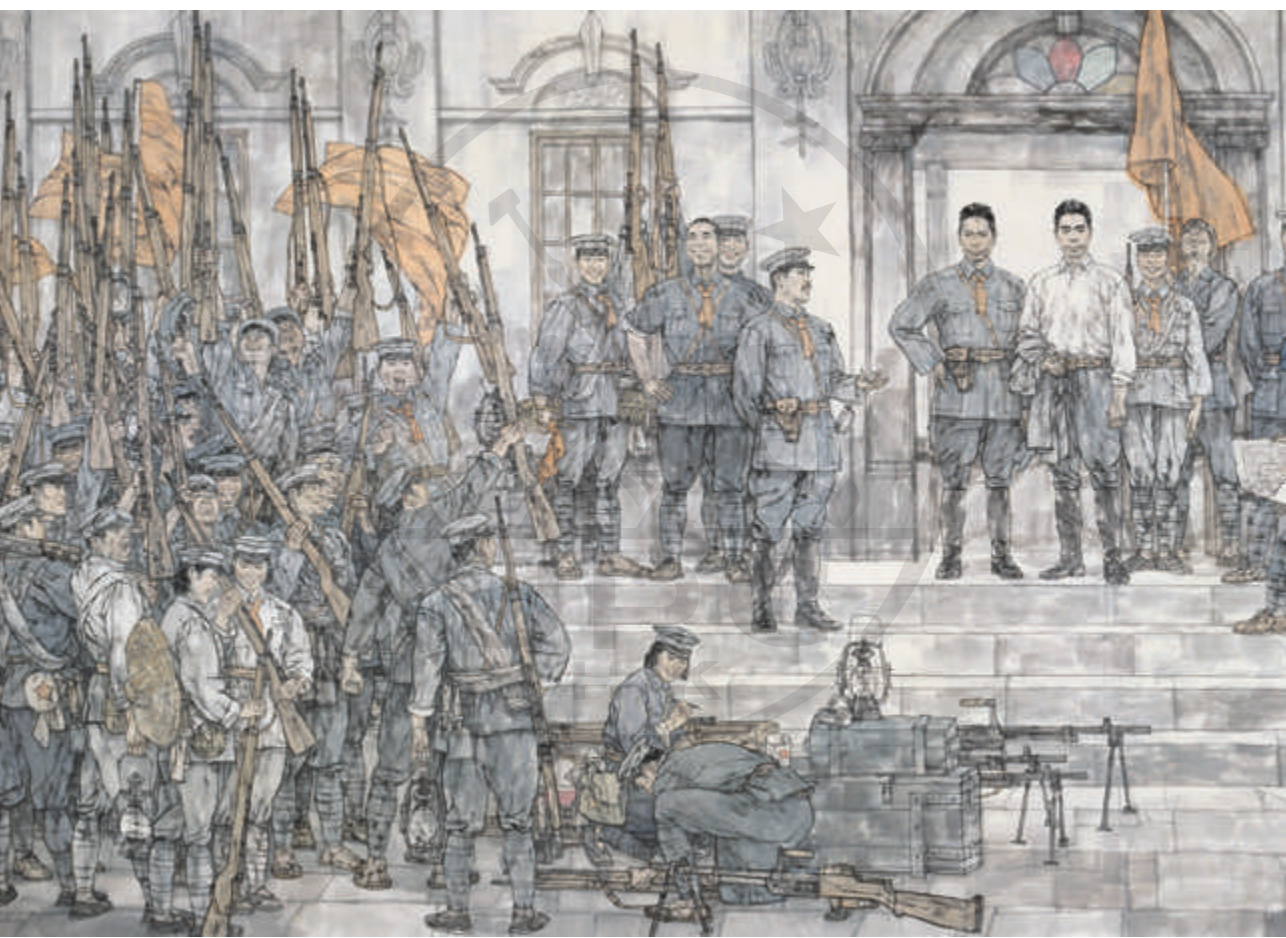


南昌起義總指揮部舊址，原為“江西大旅社”。（新華社記者萬象 攝）

了 4 個多小時，起義軍最終攻下了敵總指揮部，接著又乘勝攻佔了省政府。起義軍準備充分，部署周密，且兵力上佔優勢，激戰至拂曉，全殲守敵 3000 餘人，佔領南昌全城及郊外所有重要據點。起義取得了成功。

講到這裏，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發動南昌起義呢？

1927 年，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一場浩劫。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先後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損失。據不完全統計，從 1927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圖為畫作《南昌起義》（韓碩國 畫 中國美術館藏）。



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迫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就達31萬多人。大江南北一時血雨腥風，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還要不要堅持革命？怎樣堅持革命？這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問題。不屈的共產黨人選擇了武裝反抗。

南昌起義的總指揮是賀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他是起義後，在南下途中，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周恩來告知由賀龍擔任起義總指揮時，賀龍毫不猶豫地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就怎麼幹。”

南昌起義成功後，按原計劃，部隊第三天即開始南下，打算佔領廣東，奪取出海口，以求得到國際援助，進行第二次北伐。

但是，南下是悲壯的，意外的艱難和挫折迎面而來。由於氣候炎熱，物資匱乏，許多士兵病倒了。行軍僅 3 天，部隊就損耗了約 1/3 的士兵。

9 月，起義部隊到達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在這裏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繼續南下；朱德率領另一部留守當地，阻擊敵人。

9 月底，起義軍主力在湯坑遭遇數量 3 倍於己的敵軍包圍。經過兩天激戰，起義軍傷亡慘重，最後不得不撤往海陸豐地區。當時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等人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下，乘一條小船，在茫茫大海中顛簸了兩天一夜，最終到達了香港。

朱德率領三河壩分兵的另一支隊伍經過半年多的艱苦轉戰，於 1928 年 4 月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合。

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雖然在揮師南下的過程中遭遇挫折，但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以實際行動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定決心。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從南昌起義的隊伍中，走出了 6 位共和國開國元帥、3 位大將、4 位上將以及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

為了紀念南昌起義，1933 年 7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

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決定以 8 月 1 日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八一”成為中國人民軍隊的建軍節。後來，在設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時，毛澤東特別指示，軍旗上要有“八一”兩字，這就是“八一軍旗”；軍徽上也要有“八一”兩字，亦稱“八一軍徽”。

仰望飛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矚目軍旗上熠熠生輝的“八一”兩字，會令人內心澎湃不已。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人民軍隊！

白色恐怖下 的一次緊急會議

1927 年盛夏，武漢的天氣異常炎熱，天空陰雲密佈，不時傳來一聲聲悶雷。在這樣的天氣裏，位於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的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樓卻門窗緊閉，室內悶熱得像蒸籠一般。一群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裏召開了一次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與命運的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召開的地點是經過精心選擇的。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裏，中共中央要想召開一次會議無疑是相當危險的，所以在會議地點的選擇上需要非常謹慎。經過反覆比較，會址最後定在了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 41 號（今鄱陽街 139 號）二樓，即共產國際代表洛卓莫夫夫婦的住所。

之所以選擇這裏，是因為：其一，這幢樓房前後有樓梯，後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圖為八七會議舊址。

通小巷，屋頂涼台與鄰居涼台相通，如有異常情況，人員可立即疏散；其二，這幢房子的一樓是一個印度人開的百貨商店，周圍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國人，可以做很好的掩護。

會址選好後，參加會議的代表如何進入會場又成了難題。經過慎重考慮，中共中央決定讓代表們分3批到

達會場，有的從後門進，有的從前門進，會後也是分批撤走。為了安全和保密，代表們進來後，連窗子也不能開，吃的是麵包，睡的是地鋪。會議只開了1天，而代表們來到會場和撤離會場卻用了6天。

八七會議主要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指明了今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國共兩黨怎樣
從同室操戈到同仇敵愾？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指出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已經與中國國民黨達成共識，共赴國難。

第二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但同時強調要集中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其居高臨下的口氣可見一斑。

毛澤東迅速作出反應，認為蔣介石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這是值得讚許的，但是蔣介石在談話中尚沒有拋棄國民黨自大主義的精神，不免讓人遺憾。

先是蔣介石對中共起草的宣言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緊接著毛澤東又對蔣介石的態度作出巧妙的回擊，這反映了國共兩黨既合作又鬥爭的真實狀態。儘管國共雙方各有保留，但終究以此為標誌，形成了對中國革命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藉口士兵“失蹤” 挑起戰爭

1937年7月7日夜，駐北平盧溝橋附近的日本軍隊在進行一場名為“黃昏時接近敵主要陣地與拂曉時的攻擊”的軍事演習。演習第一階段結束後，某中隊長接到屬下一個士兵失蹤的報告。

根據後來公開的參加演習的日軍中隊長的日記記載，那個“失



北平西南宛平縣盧溝橋

蹤”的士兵隸屬於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八中隊，名叫志村菊次郎，演習中因為鬧肚子拉稀去了，事後很快跑了回來。日軍中隊長立即向大隊長報告。

在明知“失蹤”士兵已經歸隊的情況下，日軍仍然聲稱演習時“彷彿聽見由駐宛平城內的軍隊發出的槍聲，使演習部隊一時紛亂，結果失落日兵一名”，蠻橫地提出要“入城搜索”。

中日雙方於凌晨時分在宛平城進行談判。正在談判僵持不下時，迫不及待的日軍向城內開炮了，500多個日本士兵在大隊長的指揮下向中國守軍發起攻擊。駐守盧溝橋的中國士兵頑強阻擊，用大刀進行白刃戰，給日軍造成嚴重傷亡。隨後，雙方不斷增派兵力，戰事進一步升級。

消息傳到東京，日本軍國主義者一致認為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遂乘機升級戰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

也許有人會問：盧溝橋並不是中國與日本的邊界線，全面抗戰為什麼會在這裏爆發？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對當時的形勢作進一步了解。



守衛盧溝橋的中國軍隊嚴陣以待，頑強阻擊日軍。

日本的侵華戰爭經歷了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1901 年，八國聯軍侵華後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允許日本等幾個國家的軍隊在華北駐紮，司令部設在天津，兵營分設在天津海光寺和北京東交民巷兩處。

1931 年，日本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隨著日軍侵華步伐的不斷加快，日本在華北的駐軍也在暗中擴大，至七七事變爆發前，已經增加到上萬人，叫“中國駐屯軍”。這支軍隊對平津形成合圍之勢，使日本侵佔華北乃至整個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

中國有句古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直到 1945 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發生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前後持續了 14 年之久。

時間回到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國該怎麼辦？是戰還是和？是

戰的話能不能戰勝對手？

與日本相比，當時中國的國力弱到了何等地步：七七事變前，日本年產鋼鐵 500 多萬噸，中國只有 4 萬餘噸；日本年產石油 160 多萬噸，中國則不到 2 萬噸；日本年產飛機 1500 多架，中國卻連 1 架飛機也造不出來。

再說軍力狀況。儘管當時中國軍隊的陸軍數量不少，但士兵的作戰素質和武器裝備要遠遠劣於日軍；日本海軍共有 12.7 萬餘人、艦船總噸位超過 115 萬噸，而中國海軍約有 2.5 萬人、艦船總噸位不到 6 萬噸；日軍共有作戰飛機 2700 多架，而中國軍隊僅有 300 餘架。

與此相對應，當時中國的國力、軍力有多弱，失敗主義的情緒就有多高。

時任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曾公開宣揚：“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

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周佛海則說：“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

魯迅先生的弟弟、當時的文化界名人周作人不但到偽政權任職，而且說：“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

當年的中國，用一句形象的話說，就像一座破草房子，誰上來踹一腳，倒了；我們弄一個樑撐起來，他們再上來踹一腳，又倒了；再撐起來，再被踹倒。

面對這樣的形勢，公開站出來並鮮明地亮出立場的是中國共產黨。

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提出了“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的響亮口號。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7 年之後，當年製造盧溝橋事變的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已升任日本侵緬部隊第十五軍司令官。此時，日本的敗象已經顯露，他不無黯然地回憶道：“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只是這樣的反省對戰局的發展已經毫無意義了。

蔣經國和父親和好了

1937 年 4 月中旬，蔣經國從蘇聯回到上海。他給父親蔣介石買了一件黑色大理石雕刻藝術品，給繼母宋美齡選了一件羊毛外套。當闊別多年的兒子被帶進門的時候，坐在沙發上的蔣介石卻紋絲不動，用報紙擋住眼睛。

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年僅 15 歲的蔣經國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取俄語名為“尼古拉”，不久加入蘇聯共產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以後，蔣經國在集會上高喊“打倒反革命蔣介石”，並發表聲明宣稱蔣介石“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他在給生母的信中表示：“（對父親）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

1927年，國民黨當局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蔣經國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人質”，回國的希望十分渺茫。以西安事變為起點，國共兩黨關係緩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進行談判。圖為周恩來（右1）與國民黨聯絡員張沖（右2）在西安。

和，並為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商談。於是，蔣經國回國之事出現了轉機。在歷經曲折後，蔣氏父子終於見面、和好。

193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一行赴西安同國民黨代表進行第一次談判，雙方達成多項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其編制人員按國民黨軍隊同等待遇等。不料，該協議上報後，蔣介石又反悔了。之後雙方又進行了幾次談判，蔣介石提出各種苛刻條件，導致談判陷入僵局。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態度還是搖擺不定：一方面，他信誓旦旦地聲言主張抗日，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提出“地

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另一方面，他對日本當局表面宣稱的“不擴大方針”仍抱有幻想，欲向日本再次求和，導致國共會談出現障礙。

就在國共會談僵持不下時，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先後調集70多萬兵力進行淞滬會戰。中國軍隊廣大官兵不畏強敵，浴血奮戰。8月17日，日



日軍進攻上海。圖為遭日軍轟炸後的上海街道。

本政府公開宣稱放棄“不擴大方針”，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

江浙地區是蔣介石的發跡之地，多年來一直為蔣介石集團提供龐大的財力支持。如今日本人打到了上海，蔣介石感到如果再不抵抗，真要被抄老家、斷後路了。於是，8月中下旬的國共第五次會談終於出現了轉機。

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公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八路軍），下轄第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約有4.6萬人。

10月，國民政府公佈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即新四軍），約有1萬人。



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將士在觀察地形，了解敵情。圖為油畫《巍巍太行》（張文新 畫 中國美術館藏）。

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了。

國共第二次合作來之不易，是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正確地貫徹從“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策略的結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相比，此時的中國共產黨趨於成熟，中國人民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劉伯承帶頭換帽子

紅軍改編之初，首先要換衣服、換帽子：原來的灰色土布軍裝要換成統一的國民黨軍隊服裝，紅五星八角帽要換成綴有“青天白日徽”的帽子。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會覺得，這



共產黨「經濟打零分」嗎？

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成立的。

當時，中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們都在關注一個重要問題：第一次取得全國性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將怎樣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實現人民富裕、民族復興？

有的資本家幸災樂禍地譏笑說：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零分。

西方國家也有人站出來說：共產黨解決不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注定要失敗的。

就連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朋友也說：共產黨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

可見，當時經濟發展嚴重落後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難題。

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會被困難嚇倒，在中國共產黨人眼中沒有什麼困難是不可以克服的。

穩市場

首勝“銀圓之戰”

1949年2月，北平剛剛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就派人接管國民黨的銀行和造幣廠，開始設計印製人民幣。

隨後，為了儘快建立新中國的貨幣體系，解放軍解放到哪裏，人民幣就發行到哪裏。

每解放一個城市，軍管部門和人民政府就通令該城市以人民幣作

為唯一合法貨幣，金條、銀圓、外幣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嚴禁在市場上自由流通。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迎來了解放。就在當天清晨，幾十輛大卡車駛入了上海市區。這些卡車裝載著新中國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共 4 億元，其中面值最小的為 1 元，面值最大的為 1000 元。

在此之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金圓券。

為挽救其財政經濟危機，南京國民政府於 1948 年 8 月發行了金圓券，並強制人民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瘋狂搜刮人民的血汗，使社會陷入混亂、金融面臨崩潰。

金圓券流通不到 1 年，在惡性通貨膨脹下已形同廢紙。如 1949 年發行的“陸拾億（60 億）圓”票面的金圓券，堪稱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紙幣之一，但在當時的上海只能買到 70 餘粒大米。

在逃往台灣之前，國民黨反動派通過發行金圓券，撈足了真金白銀。

為了不讓老百姓破產，面對已形同廢紙的金圓券，年輕的人民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積極建立新的貨幣體系。

當時的上海軍管會規定：人民幣 1 元折金圓券 10 萬元。從 5 月 30 日開始，僅用了 7 天，人們便把手裏的金圓券兌換成了人民幣。

但是，剛剛進入上海流通市場的人民幣立即面臨著嚴重的威脅。

一方面，投機商人不顧國家財政困難，拒絕使用唯一的合法貨幣——人民幣，並公然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上海南京路四大私營百貨公司依然以銀圓為單位給貨品標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來了解放。

其他商店紛紛仿效。

另一方面，金圓券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噩夢在普通百姓心中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使他們不敢輕信紙幣，覺得金條、銀圓才是硬通貨。善於買空賣空、操縱物價的不法商人立即發現了投機空間。一時間，上海市中心的主要馬路邊到處都有“黃牛”。他們手裏拿著幾塊銀圓碰撞著，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不時與行人討價還價，用銀圓兌換人民幣。

當時，人民銀行規定銀圓與人民幣的比價為 1：100，即 1 塊銀圓兌換 100 元人民幣。但是，由於投機商掌握了大量銀圓，通過“黃牛”操控黑市價格，使得人民幣不斷貶值。

6 月 3 日，銀圓與人民幣的比價上升為 1：720；4 日，銀圓與人

民幣的比價竟狂漲到 1：1100。

猖狂的投機活動嚴重地衝擊和動搖了人民幣的地位，使物價急劇上漲，人心惴惴不安，直接影響到中國共產黨能否控制上海全局，能否保證上海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6 月 5 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上海銀圓投機嚴重影響人民幣信用的情況，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制止這一投機行為。一場短兵相接的金融保衛戰——“銀圓之戰”就此拉開序幕。

5 日，上海市財委在一天內向市場投放 10 萬銀圓。市場上馬上出現擠兌狂潮，這些銀圓彷彿石子投入深淵，被一吸而盡，銀圓價格卻一點兒也沒有回落。原來，投機勢力的胃口太大，10 萬銀圓根本不夠“吃”的。

7 日，銀圓與人民幣比價上升為 1：1800，生活必需品價格隨之上漲 2-3 倍。

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派出偵察員，查明操控黑市價格導致人民幣快速貶值的活動發端於漢口路 422 號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

這幢大樓每天聚集著大批投機分子。每天上午，他們謀劃敲定黃金、銀圓、美元 3 種硬通貨的交易比價，然後通過電話通知分散在市區各角落的“黃牛”，按統一比價操控黑市交易。

6 月 8 日晚，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採取政治手段干預市場，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進行查封，並懲辦為首的一批違法犯罪分子，堅決打擊投機搗亂活動。在向中央彙報後，中共中央華東局的這一決定得到了中央批准。



上海證券交易所舊址

經過一番周密偵察和部署，10日上午8時，200餘名便衣警察分散進入證券交易所大樓，控制了所有通道；10時，華東警衛旅派出1個營的兵力對整座大樓實行軍事包圍；緊接著，上海12000餘名工人、學生在外圍封堵交通並向市民作宣傳解釋。

隨著一聲令下，散佈在大樓中的公安人員同時亮出身份，進行突擊搜查。在場的2000多名投機分子一下子慌了手腳，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共產黨會有如此的鐵腕鋼拳，都被嚇破了膽。

這是一場乾淨利落的殲滅戰，公安人員當場扣押為首分子200多名、違法情節較輕的1800多人（後被陸續釋放）；抄沒黃金3642兩、銀圓39747枚、美元62767元、港幣1304元、人民幣1545萬多元以及投機分子囤積的大量呢絨、布匹、顏料、肥皂等商品。

查封證券交易所大樓後第二天，隨著大批投機商落網，銀圓與人民幣比價猛跌，物價回落，人民幣的主導地位很快得到了確立。

之後，以武漢、廣州為中心的華中、華南地區也開展了打擊金融投機、禁止金銀外幣流通的大規模行動，有力遏制了全國範圍的銀圓投機活動。

“銀圓之戰”最終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平物價

再贏“米棉之戰”

“銀圓之戰”的勝利，打擊了金融界的投機勢力，但並沒有讓各類投機商徹底降服。

投機商們認為“銀圓之戰”是人民政府靠槍桿子取得勝利的，那不算是真本事。他們還要和人民政府進行新的較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上海等大城市普遍物資短缺，加上受通貨膨脹影響，人們手裏有了錢，就趕緊去購買生活必需品，囤積在家裏，這就給投機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

投機商們又把目光瞄準“兩白一黑（米、棉、煤）”等商品，大量囤積糧食、棉紗、棉布和煤炭。各地物價再次掀起上漲狂潮。

“米棉之戰”由此展開。

從 1949 年 7 月到 1950 年 2 月，人民政府與投機商展開了 3 個回合的大較量。

第一回合的較量是在 1949 年 7 月，投機商首先哄抬紗價，衝擊棉紗市場，接著又將目光轉向當時緊缺的糧食和煤炭。

特別是7月11-16日的6天之中，因投機商哄抬米價，米價上漲了96%；16日起，投機商又轉而哄抬紗價，衝擊棉紗市場。如此循環哄抬物價，造成市場一片混亂。

在6月27日-7月30日的33天中，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上漲了153%，紗價上漲了1倍，米價上漲了4倍！

國民黨特務趁機叫囂：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就能置上海於死地。

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人民政府抑制物價波動、打贏“米棉之戰”的重心所在。

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沉著應對，精心部署鐵路交通部門在全國範圍集中調動糧食、棉紗等主要物資。陳雲親自坐鎮上海指揮這場戰役。

這一次，人民政府主要使用的是經濟手段。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陳雲

通過動員鐵路交通部門，人民政府將大批糧食、棉紗、煤炭等物資從全國各地緊急調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準備用調集大量物資、選擇有利時機集中拋售的方法壓垮不法投機商。

7月，國營貿易公司在上海拋售的棉紗、棉布、大米、麵粉佔到市場成交總量的1/3以上；與此同時，工商部門也加強了市場管理，

對囤積物資的不法商販進行了懲處。

這些舉措有力打擊了搶購、囤積等投機活動，控制了物價上漲的幅度。

第二回合的較量發生在 1949 年 11 月。隨著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的勝利推進，大量遊資和投機商進入上海，於是上海的主要物資很快掀起了新一輪漲價風潮。上海又一次成為“米棉之戰”的主戰場。

由於有了上一次較量的鬥爭經驗，黨和政府對貨幣供應和價格波動之間的規律有了更深的認識。中央財經委員會在具體分析了市場上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貨幣的情況後作出果斷決策，指示各地國營公司在拋售物資上“大步後退”，保存實力，除必須應付的門市以外，暫時不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



米、棉等商品既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又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何時首次命名？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鄧小平依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進行重新認識得出的基本結論。它為開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提供了行動指南。追根溯源，沒有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沒有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的歷史評價，就不會有這一命題的提出。

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 “永遠要保留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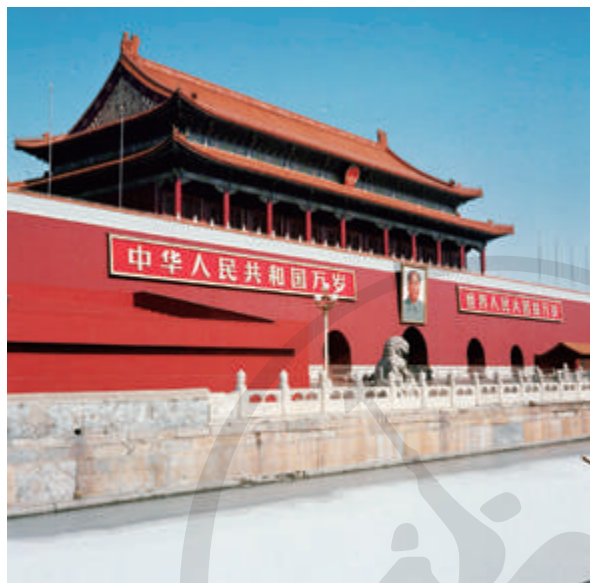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的兩次採訪。

奧里亞娜·法拉奇以採訪世界風雲人物見長，曾採訪過全世界幾十名國家元首和政要。她提出的問題直率、尖銳，面對受訪者時的姿態咄咄逼人，因此在很多人眼裏，她是個很難對付的記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接受過她的採訪，結果不歡而散。

對鄧小平的採訪沿襲了她一貫的風格，沒有客套的開場白，一上來她就提出了一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沒有遲疑，果斷而堅定地回答道，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

他又說：“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



20 世紀 80 年代的天安門城樓（新華社記者尹文俊 攝）

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法拉奇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並不是偶然的。

毛主席逝世後，全世界將目光集中到中國，關注中國共產黨如何評價毛澤東。西方有些媒體甚至揣測中國必然要“否定毛”和“非毛化”。

此時，國內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也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不願意承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不贊成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策進行撥亂反正；另一種是把錯誤都歸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進而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歷史。

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是關係全局的根本問題，影響著正在進行的撥亂反正能否勝利完成，也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穩定和未來的發展。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進行，黨內越來越多的同志感到，需要由中央對 1949 年以來一系列重大事件作出科學的評價，並形成決議，以

統一全黨的認識。

早在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當時對統一全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同樣需要黨中央對 1949 年以來的歷史問題作出一個決議。

1979 年 9 月，黨中央接受了鄧小平等人的建議，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

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領導下，一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胡喬木具體負責的歷史決議起草小組成立了。

鄧小平非常重視決議的起草，在多種場合反覆強調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法拉奇的到來正是在決議起草期間。圍繞她提出的問題，鄧小平又一次集中談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鄧小平指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還提出：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他強調：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在談到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時，鄧小平客觀地分析了原因，強

調“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而且“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他明確地回答法拉奇：“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鄧小平與法拉奇的談話澄清了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各種猜測，消除了誤解，對正在進行的決議起草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決議起草小組交出討論稿後，從 1980 年 9 月起，中共中央在一定範圍內徵求修改意見，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同年 10 月黨內高級幹部的討論。那一次大討論預定參加的人數是 4000 人，因而被稱為“四千人大大討論”，然而實際參加的人數比預定的要多。

在討論中，爭論的焦點仍是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在經過反覆修改、討論的基礎上，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又對決議稿進行了第四輪大討論。討論歷時 8 天，吸收實質性意見近百條。

從 1979 年 9 月成立決議起草小組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決議草案共進行了幾十次的修改。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地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決議》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強調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

《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科學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

《決議》的通過，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為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

— 1 —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印發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6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訪問中國，而此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

代表大會剛剛閉幕不久。

第二天，鄧小平前往釣魚台國賓館看望金日成。在談話中，鄧小平熱情地向金日成介紹了中共十二大，指出“我們中共十二大開得很好”。

在談到十二大的作用時，鄧小平感慨地說：“十二大同七大比，同七大起的作用一樣，七大是把革命引向勝利，十二大是把建設引向勝利。”

其實早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就在回顧中共七大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後指出：這次代表大會將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

鄧小平為什麼給予十二大如此高的評價，把它作為中共七大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它有哪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呢？

1982年9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面帶微笑，莊嚴宣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社會主義建設20多年的曲折發展，總結了歷史經驗，勝利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召開的。

在開幕詞中，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一新的歷史性的重大命題。

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

他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實際上提出了整個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的指導思想。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底應該怎麼走？中國共產黨從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就開始探索了。

1956 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走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中國面臨的選擇。

毛澤東毅然提出：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搬蘇聯經驗，要走自己的路。

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論十大關係》的發表、中共八大的召開以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都給予共產黨人很多有益的啟示。

遺憾的是，不久黨就偏離了八大所制定的正確路線，因此社會主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作《論十大關係》講話。

義建設走了一些彎路。

鄧小平親身經歷了這一歷史過程，作出過貢獻，經受過磨難，更有深刻的思考。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

那麼，黨在新時期的發展方向和主題又是什麼呢？

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當前以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

同時，他還強調：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怎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



時間定格在公元 2012 年 11 月 8 日。

這一天似乎很普通，時間的鐘擺按照既定的節奏，不慌不忙地走著。

然而，這一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意義非凡。

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北京隆重開幕。這次大會對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5 年後，中共十九大宣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而“新時代”的起點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共十八大以來”成為媒體使用的熱詞。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新華社記者蘭紅光 攝）

走進“新時代”

“時代”是一個時間概念，通常是指歷史上以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狀況為依據而劃分的某個時期。

在英國作家狄更斯筆下，“時代”充滿著矛盾和對立。他寫道：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馬克思對“時代”的認識則更加理性和深刻。他把人類歷史按照不同的發展階段作了多種不同的劃分，比如：

兩階段論，即前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階段論，即自然經濟時期、商品經濟時期和產品經濟時期；
四階段論，即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大工業時代；
五階段論，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從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到以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為起點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經歷了 91 年。在此期間，中國共

產黨共完成了 3 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帶領中國人民歷經 28 年浴血奮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件大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第三件大事，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向前發展。這件大事現在仍在繼續。

如果把這 3 件大事用一條線串起來的話，這條線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即：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中共十九大在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論斷的前面加了一個狀語——“經過長期努力”。

這裏的“長期”，既是指改革開放後開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又可以往前追溯到建黨以來的全部歷程。

“經過長期努力”是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是果。

有些青少年讀者可能會問：憑什麼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有哪些基本依據？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認識和找到答案。

一是所處發展階段的轉變。

什麼樣的發展階段決定什麼樣的時代。之所以把中共十八大作為新時代的起點，是因為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已經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我們能感受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後各方面發生的變化。比如：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不少領域的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綜合國力大幅增強；我國經濟在保持 30 多年高速增長之後，開始進入新常態，將保持中高速增長，實現更高質量發展；人民的獲得感不斷增強，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二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長期以來，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在改革開放前，由於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社會產品嚴重匱乏，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吃不飽、穿不暖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在一些艱苦地區，有的家庭窮得全家人只能合蓋一床被子，家裏沒有一件電器。

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得到了根本性改變。市場上的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物質豐富，基本滿足了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落後的社會生產”已不符合實際。

人餓了的時候想吃飽，飽了的時候想吃得好、吃得安全，人們的需求在不斷向更高層次發展。這時，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加凸顯。比如：城鄉、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總量、程度不充分，在很多方面經濟發展與老百姓的需要還有差距，等等。

可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

歷史性變化，這是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依據。

三是面臨國際環境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關聯性、互動性不斷增強。與之前相比，中國不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國家。目前，我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一，產品大量出口，“中國製造”享譽世界……事實證明，中國已經越來越強大了。



2018年3月，《厲害了，我的國》在全國上映。影片展示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引發強烈反響。這是影片的一張宣傳海報。

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處於世界體系邊緣的旁觀者，也不再是國際秩序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建設者、引領者，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樹大”容易“招風”。正因為這樣，西方霸權國家對我國不斷進行打壓、阻遏，領土主權、經濟貿易爭端不斷顯現。我國面對的國際和周邊環境起了新變化，這是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維度。

總的來看，在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所處新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針對國際國內形勢，世情、國情、黨情發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黨慎重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重大政治判斷，具有充分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新時代“新”在哪裏

我們中國人向來是崇尚“新”的。比如：商朝的開國君主商湯，在他的洗澡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如果能夠做到每天都清洗污垢，使身體煥然一新，那就應該天天洗，讓自己新上加新。

《詩經》中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的是，周雖然是一個古老的邦國，但它的使命在於革新。

這些都表達了古人對“新”的追求。

時代的發展總是不斷向前、不斷更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它的“新”體現在方方面面。

——“新”在國家實力更強。

中國是一個大國，有 960 多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有約 14 億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總數的 1/5。我國雖然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但是貧窮落後的面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仍處於大而不強的狀態。

比如：1978 年改革開放伊始，我國經濟總量不到 1500 億美元，

排名世界第 11 位；人均 GDP 為 156 美元，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 4 位，當時美國的人均 GDP 為 10587 美元，我們連它的零頭都不到。

那時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只有 1.67 億美元，如果不考慮貨幣貶值等因素，這點錢大概連一架造價 24 億美元的 B-2 隱形轟炸機的一個機翼都買不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的落後狀態逐步改變。

比如：到 2012 年時，我國經濟總量達到 8.6 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人均 GDP 為 6337 美元，在全世界 201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04 位。我國經濟實力有了大幅提升。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到 3.3 萬億美元，是 1978 年的近 2 萬倍，成為世界第一。

——“新”在人民生活更富。

經歷過不同的時代，國人對生活水平的變化感受太深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民辛勤勞作一年，全年的收入只有幾十元，平均每天只能掙到 1 毛多錢，生活水平極低。當時的安徽省鳳陽縣有一生產隊，10 戶人家有 4 戶沒有大門，3 戶沒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沒有棉褲，生活條件非常艱苦。

2012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近 27000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近 8000 元。大多數人告別了物質緊缺的生活，日子越過越好。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羅芳村的歷史變遷。

深圳河隔開了深圳和香港，河兩邊各有一個村莊，一個是深圳的

羅芳村，一個是香港的羅芳村（也叫“絞寮村”）。改革開放前，深圳的羅芳村村民人均年收入是 134 元，而河對岸香港的村民人均年收入是 13000 元，相差近 100 倍。於是，羅芳村村民紛紛跑去深圳河對面的香港打工，很多人到了香港那邊之後就住下不再回來了。慢慢地，這些居住下來的羅芳村人在香港那邊又形成了一個新的羅芳村。

改革開放後，深圳實現了經濟騰飛，深圳這邊的羅芳村很快富裕起來，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而河對岸香港的羅芳村村民的生活面貌卻沒有多大變化。於是，很多香港羅芳村村民又紛紛從香港回來了。深圳羅芳村從貧窮到富裕的巨大變化，是改革開放後深圳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



深圳羅芳村村民自建的小洋樓（新華社記者盧漢欣 攝）